

《八十天环游地球》与《德鲁德疑案》中的东方书写比较

郭春蓉

云南师范大学, 中国·云南 昆明 650500

摘要: 本文以萨义德东方主义理论为主要视角, 比较儒勒·凡尔纳《八十天环游地球》与查尔斯·狄更斯《德鲁德疑案》中围绕中国、鸦片与“东方”展开的叙事建构。文章认为, 两部作品并非简单呈现法国“旁观”与英国“参与”的对立, 而是在不同帝国位置中生成了两种相互关联的东方主义形式: 凡尔纳将香港、上海等港口空间景观化, 把中国纳入全球旅行与技术现代性的叙事秩序; 狄更斯则通过伦敦烟馆、华人烟客、印度水手和东方幻象的并置, 将鸦片问题转化为一种泛东方的道德污染想象。二者的差异显示了英法殖民经验、贸易利益与社会焦虑的不同配置; 二者的共性则在于都以西方主体的移动、凝视和解释权为中心, 消解了东方社会自身的历史复杂性。

关键词: 《八十天环游地球》; 《德鲁德疑案》; 东方主义; 鸦片; 殖民话语; 中国形象

A Comparison of Oriental Writing in *Around the World in Eighty Days* and *The Mystery of Edwin Drood*

Guo Chunrong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China Yunnan Kunming 650500

Abstract: Taking Edward Said's theory of Orientalism as the primary analytical lens,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narrative constructions centering on China, opium and the "Orient" in Jules Verne's *Around the World in Eighty Days* and Charles Dickens' *The Mystery of Edwin Drood*. The study argues that the two works do not merely embody a binary contrast between French "spectatorship" and British "involvement"; instead, they formulate two interrelated modes of Orientalism shaped by their respective imperial standings. Verne scenicizes port spaces including Hong Kong and Shanghai, integrating China into a narrative framework of global travel and technological modernity. By juxtaposing London opium dens, Chinese opium addicts, Indian lascars and Oriental phantasmagoria, Dickens frames the opium crisis as a moral contamination emanating from a generalized pan-Orient. Their divergences reflect distinct configurations of colonial experience, commercial interests and social anxieties in Britain and France, while their shared core lies in centering Western mobility, the Western gaze and Western interpretive authority, erasing the inherent historical complexities of Eastern societies.

Keywords: *Around the World in Eighty Days*; *The Mystery of Edwin Drood*; Orientalism; Opium; Colonial discourse; Images of China

1 问题意识与理论框架

19世纪欧洲文学中的“中国”常常不是对中国社会的直接再现, 而是西方在帝国扩张、贸易竞争与知识生产中制造出来的意义场。萨义德所谓东方主义, 并不只是若干关于东方的错误印象, 而是一套把东方对象化、分类化并纳入西方解释权的知识机制。以此观之, 《八十天环游地球》和《德鲁德疑案》中的东方书写, 关键不在于它们是否准确描绘中国, 而在于它们如何让中国、鸦片和“东方”成为西方叙事组织自身焦虑、欲望与优越感的符号资源。

本文因此将比较重点从国家道德评价转向话语机制:

凡尔纳的东方主义主要表现为景观化、旅行化和消费化, 中国被转换为全球交通路线上的可观看对象; 狄更斯的东方主义则表现为污染化、恐惧化和道德转嫁, 中国人与其他东方族裔共同构成伦敦都市黑暗面的象征。进一步说, 本文不在于指出两位作家都带有东方主义偏见, 而在于区分两种东方主义的生成方式: 一是以港口、交通和旅行速度为中心的“景观化东方主义”, 二是以烟馆、成瘾和都市恐惧为中心的“污染化东方主义”。前者把东方变成可被穿越的空间, 后者把东方变成可被归咎的源头。二者都依赖西方主体的观看权, 却在叙事功能、空间组织和情感结构上呈现出明显差异。

在萨义德之外, Bhabha 和 Spivak 的后殖民理论有助于进一步细化本文的问题意识。Bhabha 关于殖民话语“矛盾性”的讨论提示我们, 帝国叙事并不总是稳定地贬低东方, 而常常在吸纳、模仿、恐惧和排斥之间摇摆; Spivak 对“底层能否发声”的追问, 则提醒我们关注文本中哪些东方人物被允许说话, 哪些人物只能作为身体、景观或噪音出现。由此, 本文不仅讨论西方如何看东方, 也讨论东方在叙事中为何难以获得自我阐释权。

2 港口空间与旅行凝视:《八十天环游地球》的景观化东方

《八十天环游地球》中的中国场景主要分布在香港、上海等港口节点。它们不是完整的社会空间, 而是福格一行继续环球旅行所必须经过的交通驿站。凡尔纳笔下的轿子、街市、理发店、官员和船夫, 往往以快速掠过的景观形式出现; 这些元素具有鲜明的地域标识, 却很少发展出独立人物关系和社会厚度。中国人在叙事中大多承担服务旅行、制造异域氛围或推动情节转场的功能。

这种写法并不等同于直接妖魔化中国。相较于英国维多利亚叙事中常见的“东方危险”想象, 凡尔纳更倾向于把中国作为可被观看、记录和穿越的文化景观。问题恰恰在于这种看似温和的景观化: 它将中国从具体历史中抽离出来, 使中国成为西方旅行主体展示速度、理性和技术优势的背景。福格的环球旅行因此不仅是个人冒险, 也是西方现代交通体系对世界空间的测量和占有。

香港在小说中既是中国空间, 又是鸦片战争后形成的殖民港口; 既连接亚洲贸易网络, 也服务于欧洲旅行者的时间表。凡尔纳没有充分展开香港作为殖民枢纽的复杂历史, 而是把它处理为旅程中的中转站。这种处理方式使香港的政治性被交通性遮蔽, 殖民暴力被航线、票据、轮船和时间计算所替代。换言之, 帝国秩序不是以战争场面出现, 而是以看似中性的全球流动能力出现。

原文对香港的介绍本身就带有殖民空间的双重性。叙述者称香港是英国在《南京条约》后获得的岛屿, 并把它形容为“Treaty of Nankin”之后出现的“excellent port”。这里的关键词不是中国社会, 而是条约和港口; 历史暴力被压缩进条约名称, 殖民结果则被赞美为城市功能。紧接着, 香港又被比作“Kent or Surrey”, 这不是简单的风景比喻, 而是把中国港口转译成英国地方空间, 使殖民地在想象上变成英国秩序的海外延伸。

上海在小说中的意义也可以从这一角度理解。它并非作为一个有社会关系和历史记忆的城市展开, 而是作为航线调度中的目的地或错过之地存在。城市被压缩为交通网络上的坐标, 读者看到的不是晚清中国在条约体系下的复杂处境, 而是西方旅行计划如何利用这些港口完成跨洲移动。凡尔纳的叙事由此把殖民扩张的空间后果转译为冒险小说的时间紧张: 轮船是否赶得上、路线是否可替换、旅行是否能如期完成, 取代了对港口殖民性的正面追问。

这种空间转译在叙事细节中反复出现。香港街头被写成呈现“English supremacy”的地方, 路路通看到的则是“curious palanquins”等可供观看的风俗物。前者说明港口已经被帝国权力重组, 后者则把本地生活降格为旅行者眼中的异域陈列。到上海段落, 船主提出可沿“Chinese coast”前往上海, 文本关心的是距离、风向和航线, 而不是中国沿海在列强通商体系中的处境。由此可见, 凡尔纳的东方书写把殖民空间自然化为交通空间。

在这一意义上, 福格的理性和守时并非单纯的个人品质, 而是帝国现代性的叙事化形式。中国场景越被写成静态、局部和可观赏, 福格的移动就越显得高效、现代和普遍。凡尔纳没有把中国人写成绝对邪恶的对象, 但他同样没有赋予他们解释自身处境的声音。景观化东方主义因此仍然是一种权力结构: 它用欣赏替代理解, 用风景替代历史, 用旅行者的速度替代本土社会的复杂时间。

3 烟馆空间与泛东方意象合集:《德鲁德疑案》的污染化东方

本文借用德勒兹(Deleuze)与加塔利(Guattari)提出的意象合集(组装体、组合体)概念, 将烟馆中的华人、印度水手、鸦片、幻觉和地下空间理解为共同生成意义的异质要素网络。《德鲁德疑案》的东方场景则集中在伦敦烟馆。小说开篇并不把读者带到中国本土, 而是把“东方”移植到帝国首都的阴暗角落: 华人烟客、印度水手、憔悴女子、烟雾和幻觉共同构成一种混杂的都市边缘空间。这里的中国形象不能被孤立理解为单一民族形象, 它更接近一种泛东方符号, 与印度、伊斯兰世界和鸦片幻象一道, 服务于维多利亚社会对道德衰败、成瘾和帝国反噬的想象。

《德鲁德疑案》中的东方场景并不等同于中国本土书写, 而是伦敦烟馆中的泛东方意象合集, 或者说“符号组合体”: 华人、印度水手、烟馆、苏丹幻象、白象仪仗、舞女和烟雾感官被混合为一个“东方污染”的符号场。狄更

斯并不是在建构一个地理准确的中国,而是在帝国都市内部制造一个可被恐惧、可被凝视、也可被归咎的东方集合体。

小说开篇的幻觉场面已经预设了这种混杂结构。贾思伯首先看到不应出现于眼前的“Cathedral Tower”,随后幻象突然滑向“Sultan”和“white elephants”。英国教堂、土耳其苏丹和东方仪仗被同置于一个破碎意识中,说明东方并非稳定地理对象,而是由成瘾意识拼贴出的感官图像。帝国中心的宗教建筑被东方幻象遮蔽,暗示伦敦/克洛斯特哈姆的秩序已经被其自身殖民想象侵入。

更重要的是,这个符号组合体并不要求各个东方元素在历史上彼此准确关联。恰恰相反,它的运作逻辑是混同:华人烟客提供身体化的异族形象,印度水手提供帝国航运和殖民劳工的暗示,苏丹幻象提供奢靡、专制和感官过剩的东方戏剧性,烟馆则把这些元素封闭在伦敦内部的昏暗空间中。不同地域被压缩成同一种情绪效果,即“东方会污染帝国中心”。这种混同机制,比单纯的中国形象丑化更能说明维多利亚东方主义的生产方式。

烟馆内部的原文证据更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床上并列出现的是“Chinaman, a Lascar”和“haggard woman”,三者不是按民族、阶级或性别被分别展开,而是共同构成一个身体衰败的场景。老妇反复谈到“market price of opium”,又把毒品、贫困和交易语言缠绕在一起。此处的东方性不是单一人物属性,而是由族裔身体、商品价格、地下经济和成瘾感官共同生成的污染气氛。

华人烟客在这一符号组合体中处于沉默位置。他没有姓名、没有叙述权,也没有独立行动;他的身体被描写为昏沉、扭曲、近乎非理性的存在。印度水手则把烟馆空间进一步从“中国”扩展为“东方”;贾思伯关于苏丹和白象的幻觉,又把东方从现实族裔推向感官过剩的梦魇图像。中国因此不是一个明确的地理对象,而是泛东方想象中的一个节点。正是这种节点化处理,使东方被压缩成污染、诱惑和退化的共同名称。

4 鸦片、责任转移与帝国反噬

两部作品都触及鸦片,但鸦片在叙事中的功能并不相同。凡尔纳在香港烟馆段落中明确谴责英国商号通过鸦片牟利,并以具体金额强化这种道德控诉。这一批判使作品显得具有反殖民锋芒。然而,凡尔纳并没有继续追问鸦片贸易如何依托军事暴力、不平等条约和殖民港口制度运

转;鸦片问题在文本中很快被吸收进旅行叙事,成为福格一行遭遇的地方性危险,而非现代帝国经济结构的核心症候。

文本写烟馆中有“balls of opium”,吸食者则成为“stupefied sots”。这些词语使鸦片首先呈现为可见的物和可厌的身体状态,而不是贸易制度。后来路路通仍受“stupefying influence of the opium”影响,叙事重心随即转向他是否误船。这样一来,鸦片造成的历史伤害被转换为冒险情节中的偶发障碍,殖民贸易的结构性暴力被个人遭遇和旅行延误替代。

狄更斯对鸦片的处理更为焦虑,也更具转嫁机制。《德鲁德疑案》把贾思伯的成瘾、幻觉和道德坠落置于伦敦烟馆之中,但烟馆的东方化布置使鸦片仿佛来自外部世界的污染。鸦片本是英国主导贸易体系中的商品,却在文本中被重新编码为东方腐蚀西方的象征。这样一来,帝国贸易的责任被部分转移,英国社会对成瘾和都市衰败的焦虑也获得了一个可以被外化的对象。

狄更斯的写法则更强调污染的传染性。老妇被写成与华人烟客具有“strange likeness”,这种相似不是文化交流,而是鸦片把白人贫民身体东方化的结果。华人烟客被联想到“Gods or Devils”,语言则被贾思伯判定为“Unintelligible”。前者把东方宗教压缩为迷信和恐惧,后者剥夺东方人物的可理解性。鸦片因此不仅损害身体,也制造解释权的的不平等:西方人物可以命名和判断,东方人物只能发出无法被承认为意义的声音。

这一点正是东方主义话语的复杂之处。东方主义并不只是贬低东方,还通过贬低东方来处理西方自身无法公开承认的矛盾。英国在鸦片贸易中获利,却又在本土面对成瘾、贫困和都市犯罪等社会问题;文学叙事便把这种内部危机投射到东方他者身上,使帝国既保留经济利益,又在道德层面把自身想象为受害者和拯救者。

从这个角度看,《德鲁德疑案》的烟馆不是简单的犯罪场景,而是帝国反噬的缩影。鸦片经由贸易、殖民和航运从东方想象回到伦敦,最终在帝国中心制造精神和道德危机。狄更斯似乎意识到帝国扩张会把边缘问题带回中心,但他的文本又没有真正把责任指向英国贸易制度,而是通过东方化的烟馆把问题重新外部化。由此形成一种矛盾结构:小说既显露帝国罪恶的回流,又用东方污染叙事遮蔽这种罪恶的制度来源。

5 沉默的人物与叙事解释权

除空间和鸦片之外,人物声音也是区分两部作品的重要层面。凡尔纳笔下的中国人多数是功能性人物,他们帮助、引路、服务或构成风俗背景。狄更斯笔下的华人烟客则更加极端地失语,他几乎完全被身体化和物象化。二者差异虽大,却共享一个问题:东方人物很少拥有解释自身处境的权力,他们被西方叙述者、旅行者或成瘾者的视角所定义。

这种沉默并非偶然,而是东方主义叙事结构的一部分。凡尔纳的沉默来自旅行叙事的速度:福格必须继续前进,因此本地人的历史无法停留展开;狄更斯的沉默来自哥特化和犯罪化的氛围:华人烟客必须保持神秘和不透明,才能维持烟馆作为危险空间的效果。前者以速度消解主体性,后者以恐惧压制主体性。两种方式都使东方人物从社会主体降格为叙事功能。

Spivak 的问题意识在这里尤其有用。华人烟客并非完全没有发声,而是他的声音在文本中被转化为“不可理解”。这与其说证明他没有语言,不如说证明叙事权力拒绝承认他的语言。凡尔纳文本中的中国人物也常处于类似位置:他们可以引路、服务、交易,却很少解释香港、上海或鸦片对自身社会意味着什么。东方人物的沉默因此不是现实沉默,而是叙事分配的结果。

由于《德鲁德疑案》小说没有完成,贾思伯的罪责、烟馆空间和东方幻象之间的最终关系没有被完全收束。这种开放性反而暴露出文本深层的焦虑:东方并不是一个可以被情节结尾轻易驱逐或解释清楚的外部对象,而是已经进入伦敦、进入身体、进入欲望结构之中的不稳定力量。与凡尔纳小说中可被穿越并留在身后的东方不同,狄更斯的东方无法被简单离开,它以烟雾和幻觉的形式滞留在帝国中心。

Bhabha 所说的殖民矛盾性也可以解释这种滞留。帝国一方面需要把东方塑造成低劣、危险和有待治理的对象,另一方面又不断依赖东方商品、东方劳工和东方想象来维持自身经济与文化活力。烟馆中的东方既被排斥,又已成为伦敦的一部分;既被描绘为外部污染,又暴露出帝国内部本就存在的裂隙。狄更斯文本的原创分析价值,正在于它把这种矛盾压缩进一个狭小、肮脏、充满烟雾的都市空间。

6 从民族差异到帝国共谋

英法差异仍然重要,但它不应被写成法国清白、英国有罪的二元对照。凡尔纳的法国视角较少直接承受英国维多利亚社会内部围绕鸦片贸易形成的道德焦虑,因此更容易发展出轻盈、猎奇、旅行化的东方图景;狄更斯的英国视角则因鸦片贸易和帝国责任更加直接,更倾向于把东方写成危险、腐败和污染的来源。前者是景观化的东方主义,后者是污染化的东方主义。

但二者共享同一个更深层的叙事前提:东方缺乏自我阐释能力,必须经由西方观察者、旅行者或成瘾者的经验被理解。在凡尔纳那里,中国被纳入西方交通网络和冒险时间表;在狄更斯那里,中国被纳入伦敦都市病理和帝国道德危机。无论是可消费的景观,还是可恐惧的污染源,东方都被置于西方主体的凝视之下。

因此,两部作品的比较价值不在于证明某一民族文学更温和或更激进,而在于揭示东方主义话语的弹性:它既能以浪漫化、知识化和旅行化的方式出现,也能以犯罪化、病理化和妖魔化的方式出现;既可以批判帝国贸易的肮脏,也可以在批判中重新确认西方解释世界的中心地位。凡尔纳与狄更斯的差异,最终指向的是同一套西方中心主义知识结构在不同民族文学中的变体。

7 结语

《八十天环游地球》与《德鲁德疑案》展示了19世纪欧洲文学中东方形象建构的两种面向。凡尔纳把中国和东亚港口写成环球旅行路线上的景观节点,使东方成为西方现代性速度与秩序的参照物;狄更斯则把中国人与鸦片烟馆置于伦敦黑暗空间之中,使东方成为帝国本土焦虑和道德危机的替罪符。两者在表层策略上不同,却共同依赖西方中心主义的知识结构。

本文尤其强调,《德鲁德疑案》中的东方场景不是单纯的中国形象,而是由华人、印度水手、烟馆、苏丹幻象和鸦片感官共同构成的泛东方意象合集。这个符号组合体把多个东方地域压缩为同一种污染想象,使帝国中心的社会问题被重新解释为外部东方的侵入。与之相比,凡尔纳的中国书写虽然较少呈现恐惧和妖魔化,却通过港口景观、交通路线和旅行凝视,把中国纳入西方现代性的空间秩序。由此可见,东方主义既可以以恐惧形式出现,也可以以欣赏、旅行和知识化形式出现。

参考文献:

- [1] Hartono, Febelina Christivani. The Image of Asia in Jules Verne's *Around the World in Eighty Days*. Faculty of Letters, Soegijapranata Catholic University, 2009.
- [2] Polsky, Stephanie. "The Novel Ingestion of Opium and Orientalism in *The Mystery of Edwin Drood*." *The Victorian*, vol. 3, no. 1, 2015, pp. 1-26.
- [3] Said, Edward W. *Orientalism*. Pantheon Books, 1978.
- [4] Verne, Jules. *Around the World in Eighty Days*. Translated by Xiaoyue Hu, Tianj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6.
- [5] Dickens, Charles. *The Mystery of Edwin Drood*. Translated by Juan Du, Bin Du, and Chao Guo,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2016.
- [6] Ashcroft, Bill, Gareth Griffiths, and Helen Tiffin. *The Empire Writes Back: Theory and Practice i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s*. 2nd ed. London: Routledge, 2002.
- [7] 儒勒·凡尔纳. 八十天环游地球[M]. 胡小跃, 译.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6.
- [8] 查尔斯·狄更斯. 德鲁德疑案[M]. 杜娟, 杜彬, 郭超, 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6.
- [9] 王祖基. "论凡尔纳《八十天环游地球》中的东方书写."《名作欣赏》, 2015.
- [10] 宁艺阳. "19世纪英国的社会焦虑与仇华情绪——鸦片贸易背景下的狄更斯遗作《德鲁德疑案》."《外国文学研究》, vol. 1, 2021, pp. 142-151.

作者简介: 郭春蓉(2001.12-), 女, 傣族, 云南普洱人,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英美文学。